



世纪前沿

[英] 提摩太·贝维斯 著

Timothy Bewes

胡继华 译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

[英] 提摩太·贝维斯 著 胡继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英)贝维斯(Bewes, T.)著;
胡继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Cynicism and Postmodernity
ISBN 978-7-208-07496-5

I. 犬… II. ①贝…②胡… III. 犬儒主义-研究
IV. B50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3362 号

责任编辑 姚映然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

[英] 提摩太·贝维斯 著
胡继华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44,000
版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496-5/C · 308
定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中文版序/1

导论/7

第一章 犬儒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物化/24

1. 一幅后现代漫画？ /24
2. 后现代主义相对于本真性/30
3. 被包含和被舍弃的后现代犬儒主义/45
4. 犬儒主义作为个体意志的手段/62
5. 物化：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历史瞬间影像/68

第二章 回归无路——本真性拜物教/74

1. 渴望符号“透明性” /74
2. 政治的终结？ /100
3. 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112
4. “共同体”的迷误/119
5. 反思汉娜·阿伦特/129

附录：形而上学与解构的对质/131

第三章 能量对深度——平庸的诱惑/149

1. 泾渭分明的对立/150
2. 拉摩的侄儿：对立面的瓦解/160
3. 后现代不确定性：一种卑贱的伦理学/167
4. “没有深度的能量”：美国病的征候/174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

5. “没有能量的深度”：欧洲病的征候/197
6. 艾希曼——内在性标本研究/218
7. 政治、内省、后现代性/234

第四章 论自信以及有条件的投降/243

1. 在社会和孤高之士之间/243
2. 沿着切斯特顿的“中间道路”漫游/250
3. 一对现代切斯特顿式的人物/260
4. 结论：犬儒主义与后现代主义/274

结论——一种黑格尔式推论/283

1. 正题/284
2. 反题/287
3. 合题/292

中文版序

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的地方宣称有丑行；而且厚颜无耻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时刻夸耀胆量。

——德勒兹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1]

《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一书在英国本土出版之后，一晃十年过去了。拙著于1997年初问世，几周之后，也就是在当年5月1日，英国工党以压倒性的多数选举托尼·布莱尔为首相，这标志着撒切尔夫人及其继任者约翰·梅杰为首的保守党长达18年的统治之终结。布莱尔殚精竭虑，致力于使工党“有竞选能力”，但随后十几年的事实表明，工党在选民眼里恐怕已经成为“极端无能”的执政党了。这么一段政治行程恰恰与拙著《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写作的过程同步。在这一时间段内，布莱尔几乎是发疯似地论说“犬儒主义”：言锋所向，不仅是（对他的现代化纲领颐指气使的）工党元老，而且包括政治对手保守党，甚至广大的英国选民，统统都在“犬儒主义精神”的笼罩之下。竞选之后五个月，在工党的年会上，他正式宣告五月大选之中被击败的不仅是托利党人，而且还有犬儒主义。^[2]

[1] Deleuz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 292.

[2] “布莱尔呼唤施予的时代”，见《无限卫士》（“Blair calls for age of giving”，in *Guardian Unlimited*），1997年10月1日。<http://politics.guardian.co.uk/speeches/story/0,,1052733,00.html>.

尽管拙著名为《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可是其意旨既不在犬儒主义，也不在后现代主义。不如说，它关心的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推论建制。在这种建制之中，诸如犬儒主义、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概念彼此合谋，既阻碍着思想（而思想被认为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永恒地向尚未被思考的东西敞开），又阻碍着政治本身。尽管在英国政治历史上，“布莱尔主义”，或者“新工党纲领”堪称典范，但我所说的这么一种意识形态和推论建制当然并不局限于他们。拙著的意图在于做这么一种思考：像“犬儒主义”、“后现代主义”概念这些用法，在上述话语建制中是否可能成为最可靠的指标，赖以显示我们应该追寻的期许之地，即显示政治本身。这一意向之关键在于，把政治构想为一种同“实在世界”（world as it is），诸如控制生存环境、勤俭持家以及一般的经济活动完全无关的领域。用阿多诺的话说，这么一种“似是而非的活动”（pseudo-activity）并非建构而是损害了政治运作。同时，政治亦不关怀诸如自由、诚挚、善良等抽象价值。依据拙著所提出的这一政治构想，这些抽象价值仅仅适合于沉思默想或者宗教献身的那些内在境界。质言之，政治仅仅与阿伦特所说的“行动”相关。

此处的行动，不仅是指施加于一个被动等待和消极接受的世界上的“直接行动”；它还必然要拒绝这个世界在概念上的稳靠性——首先是指拒绝它对于存在论正直气节（ontological integrity）的实在主义诉求。布莱尔是从实在主义出发废黜政治性的典范，但这种政治性废黜却采取了一种提升的形式，即把那些“价值标准”升华到世界观的高度，认为世界是永远必须被创造和改造的东西。在拙著中一段常常被引用的文字里，我曾经写道：“说孩子们应该完成家庭作业，就像说草地应该是绿色的，狗应该狂吠一样，既是客观的又是政治的，同样天经地义。”^[1]

这层理论分析本来与“后现代思想”的主流没有太多的瓜葛；其引

[1] 见本书第 255 页。

导性的论点存在于那些同古典社会理论相联系的思想家——如黑格尔、马克斯·韦伯、阿伦特和吉里安·罗斯的著作中。拙著所仰赖者，还有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晚近思想家著作中的“意识形态批判”。^[1]但是，将一个人自己的思想同这种那种思想流派联系起来，恰恰有悖于该书的精神。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就是一个明证：他一方面将自己定位在一种十分亲近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又断言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绝对不一致的系列理论的一个虚名”^[2]，事实上的特征只能是断裂：比如在马克思与列宁之间、在斯大林与列宁之间、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在阿尔都塞和毛泽东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断裂。同样，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的论证逻辑中，有一个核心的内涵，那就是后现代主义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倒不如说它是对于一种思想形式的批判，而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历史存在观正是这种思想形式的症兆。

也许，在这层涵义上，拙著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后现代”作品。无独有偶，另一个跨越界限而超越同一悖论的理论文本是利奥塔的“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现代主义？”。在这篇文章里，“后现代”对立于自己的实在论背叛者：坚持将后现代还原为一种美学风格、一个历史时段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过程之中的一个纯粹阶段，则是思想的一次败笔。利奥塔写道：后现代以“未来先行”这么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它反对或者违背“事态当前”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这一原则就是那种描述式实在论话语建制，它致力于用“一些令人称心愉快的对象和情境”来满足“对实在性的流行病式的渴望”。依据利奥塔对后现代性的理解，真正的犬儒主

[1] 佩里·安德森：《论西方马克思主义》(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1979)。

[2] 阿兰·巴丢：《元政治学》(Metapolitics, trans. Jason Barker, London: Verso, 2005), 第58页。

义隐含在资本吆喝贩卖的“实在论幻象”中，哗众取宠，色情迷离，其最耀眼的形式，就是“一切都行”的“后现代”折中论调，即金钱实在论。^[1]

面临这么一种彻底囊括了“政治游戏”的实在论幻象，至少对于某种类型的个体而言，最稳妥的政治选择就是从政治参与之中抽身而出。此乃该书讨论犬儒主义精神气质之历史演变的起始。在对于上述话语体制的讨论中，“犬儒主义”被用来指代这么一种个体：他拒绝个体化，甚至宁愿悖逆其自身旨趣而行，而非自我认识以便适合主流意识形态旨趣而行动。这种感性化精神气质的原型可能存在于距离当今时代（以及正在被思考的“政治”领域）非常遥远的作家的作品中：狄德罗《拉摩的侄儿》，亨利·詹姆斯《黛西·米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叙述者），克利斯托夫·马尔罗《塔姆布莱纳》，黑格尔（分裂意识），以及瓦尔特·本雅明（“破坏型人物”）。这些犬儒主义形象就成为这种意识的历史靠山；这种意识在本质上希望无限扩张，主动以身试法，根本上就不安于现状，而且对现存世界所提供的一切形式感到不满。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定义，它怀着只有在这么一种不可能的条件下才有抵达可能性的希望，并以此为信仰去奋力追寻“不可能性”。

初版十年之后，依据某些不同的取向追溯该书所开启的论证逻辑，回头再读该书，我觉得《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仍然是一部有生命力的著作，其活跃的生命力来源于它深沉地对立一切“物化”形式，当然这个概念取自乔治·卢卡奇的开拓性研究所赋予的意义，¹即指将商品化的逻辑延伸到思想领域。展示“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的这场遭遇，我希望将政治从形而上学领域之中解放出来。但这里的形而上学

[1] Jean-François Lyotard,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Postmodernism?” trans. Régis Dur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75, 76.

领域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一种如此倔强地将政治局限于管理事务领域的存在论结构(政治就是一种官僚制度)；以及更粗俗一点的，一种迫使政治出面捍卫的普遍的或单纯属于文化的价值意识形态(政治就是一种使命)。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似乎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事件，美国对此事件的愚蠢反应，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卑劣努力(这一过程是以布莱尔首相对北约军事介入的辩解为始作俑者)，这一切都在推波助澜，再次将政治范畴进一步驱遣到形而上学领域。依这些事件来看，《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努力为政治思想所确立的准则显然是理想主义的，充满了绝望的悲情。当《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中文简体版问世的时候，布莱尔将息影政坛，从而终结一个任期，根本没有为意识形态(当然是在其作为“虚假意识”的这一最基本的意义上)的安然无恙留下任何值得怀疑的迹象。如果说在该书之中还有什么当前“事态”的回声(按照利奥塔的讲法，拙著本身就要拒绝这一观点)的话，那么，它也只能属于历史的陈年旧迹的绝望回声。阿多诺把黑格尔的思想描述为“悖论的牺牲品，它一方面为科学和学术所淘汰而成为陈年旧迹，另一方面同时也比任何一种对立的观点更合乎时宜。”以这么一种超绝高远的古朴模式为鹄的，无疑是拙著所无法完成的志业。但是，它的典型例子却给了我一个理由：面对这种“历史陈迹”而维护政治的可能性，则需要这种极端不切实际的政治精神气质。恰恰在这个时刻，我要特别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所的胡继华教授翻译我的这本书。

提摩太·贝维斯

2007年3月于布朗大学

导 论

当赞美之声“多美呀!”破坏了一片自然风景之时,这片风景变得更加丑陋。

——阿多诺^[1]

一万张嘴同时说一件事,也会让一个陈述成为谎言,即使它碰巧是真理。

——(托名)索伦·克尔凯郭尔^[2]

我生而对矛盾充满激情。我的整个生命无非就是一系列与精神或理性背道而驰的努力,可总是以悲哀与失败为伴。狂热之士使我变得冷酷如冰;我惊奇地发现,与冷漠的游手好闲之士频繁交往,却可能把我变成炽热的理想主义者。

——莱蒙托夫^[3]

[1] 阿多诺:《本色的行话》(Theodor Adorno, *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 trans. Knut Tarnowski and Frederic Will,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p. 26。

[2] 此乃马尔康姆·穆格里齐(Malcolm Muggeridge)在普遍传播基督教福音的牢萨尼大会(Lausann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上所说的。

[3] 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当代英雄》, Paul Foote 英译本(*A Hero of Our Tim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6), p. 98。

笼统地讲，犬儒主义意味着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某种关系。它最初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此后就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价值的精神，一种不仅驳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还拒绝返身自顾，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

在现代语境中，犬儒主义的意义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他们的异化体验，现代犬儒冷酷无情，返身自顾，万念俱灰，而根本不至于沉湎其中。犬儒主义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理由而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犬儒主义背叛了崇高的价值，而对于这些价值领域而言，真理和诚实的抽象化比行为和想像的政治品格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本书论述犬儒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当代政治的关系。犬儒具有典型的后现代品格，他是一个不仅异化于社会而且异化于其主体性的形象。“犬儒主义”是一个被那些政治家、批评家和评论家当做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的概念。这是一种文化关系，犬儒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这种关系之中最初都作为政治修辞工具而发生作用。现有的论著尚且没有对现代犬儒主义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谱系，也没有详细分析晚近现代犬儒主义的流行之中当代思想呈现的复杂程度。而这两件事就是目前这本书所勉力为之的。我认为，犬儒主义在当代生活之中的意义膨胀，恰恰证明了政治关怀的置换迄今依然没有被研究和说明。换句话说，当代人对于“犬儒主义”概念的过分热衷恰恰就是政治建制和政治实践本身出现了危机的症候。

作为主流政治意识的参照点而出现的犬儒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相当晚近的现象。1996年7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意欲向英国知识分子暗送温情，呼吁他们支持“工党”的“新政联合理念”，此乃他最明确的誓言，宣布自己要担当起将政治从明显地

导致了当代政治文化的“冷漠与幻灭”之中拯救出来的使命。更加意味深长的也许是他还利用明显来源于后现代理论的概念系统来解释这种普遍的幻灭情绪，他写道：“1964年以来，时代精神的巨变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的认识，左派和右派的整体化意识形态再也于事无补了。”^[1]在政治语境之中使用这种语言委实让人困惑，人们因此决定去探究这种措辞的政治文化意蕴，于是，当代理论著作应运而生。但是，我将要论证，将此等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运用于政治领域并不恰当，而可能仅仅作为一条原则发生作用，表明政治的自我退缩而已。故此，后现代主义就被视为客观实在状态的一种存在论宣言（元叙事的幻灭），而非拷问客观实在的一种理论策略（一种“对元叙事的置疑”）。^[2]也就是说，所谓“后现代性”，就是抽象历史进程的物化（reified），即从一系列批判主张转化为时代精神（Geist）的最新呈现物。托尼·布莱尔的主张可谓政治本身之内更宽泛问题的征兆：这是一种倾向，即向实在屈服，而非冒险进入界定和重构政治现实的宏大计划中；这是一种欲望，即从真正的政治活动之中退缩出来，而非主动去体验“追求不可能之事”（马克斯·韦伯语）所招致的风险。^[3]

当然，在一个层面上，人们完全没有理由推断，托尼·布莱尔“将工党现代化”（一个例子）的政治计划事实上是对行动的拒绝，或者推断托尼·布莱尔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消极被动、软弱无能的人物。不言而喻，“将工党转化为政治竞选党”而不问其正当性的过程，业已经过了

[1]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意识形态的暗淡”(“Ideological Blurring”),见《瞭望》(Prospect), 1996年6月,也以“伟大思想的巨变”为题发表于《卫报》1996年5月27日。

[2]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xxiv.

[3]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合编:《韦伯社会学论文选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8), p. 128.

相当周密的考虑，至少布莱尔本人深信这一点。一个政治家会对张扬政治意识形态不可能性的“后现代”观念投以信任——“清除过时意识形态、政策和机构的枯木”，从而反其道而行之，对后现代观念作出回应，随后以“折中调和的知识分子”友好共同体所提供的“诸种观念”为基础努力去整饬政治领域，^[1]这一切无论如何都表明了一种政治志业的堕落，显示了一种将“应然存在的世界”调校为“实然存在的世界”的欲望，质言之，表明了政治象征伟业本身的废黜。当代政治所无法摆脱的耻辱与其说是来源于个别政治家的卑微怯懦，不如说是来源于政治活动的集体撤退，其标志是后现代政治修辞所呈现的集体无安全感。

对于政治存在或政治的应然存在的过分自觉，是后现代的焦虑感转换到政治领域留下的一笔遗产。因此，惟一的结局仅仅是改良政治进程。一种供求关系塑造的基本品格渐渐主导了政治，政治本身亦成为消费者享有至上权力的王国，领导权和政府意志概念也在其中成为举足轻重而又聚讼纷争的利益所在，而这些概念却只能以中介的方式才能延存。大众文化从政治领域的撤退留下了一个真空，犬儒主义乘虚而入，出现在这个空间。政治活动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以犬儒姿态安身于这么一个社会。政治行动所固有的内在暴力，即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严格地排斥在后现代政治之外的要素，现在却集中存在于真正政治领域之外的一个领域——也就是说，这个领域拒绝政治家出于一种在政治上敌对于“实然世界”的策略考虑而采取的反动倒退的话语。一旦这种策略也落在“犬儒主义”名下，其争论的锋芒在原则上就指向了现代或后现代返身自顾的犬儒主义，这是一种被彼得·斯洛特蒂克(Peter Sloterdijk)称之为“启蒙的虚假意识”的流行病，一种可能与政治家本人对政治性的当代焦虑紧密相关的多情善感。^[2]

[1] 托尼·布莱尔：《意识形态的暗淡》，同上页注[1]所引。

[2] 彼得·斯洛特蒂克：《犬儒理性批判》(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trans. Michael Eldred, London: Verso, 1988), p. 5.